

导 论

这本书主要研究全球化的（有时由国家推进的）市场力量的强大推动力与社会需求引起的反作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这里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辨明全球化的满意形式，即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历史性变迁和因而产生的不满意形式。包含在这些基本问题内的具体问题将在本书的各章中提出。

与以往许多对全球化问题的解释不同，这本书试图提供一种全面的和多层次的分析，即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相联系，将代理人与多重结构相结合，并且使不同的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场所彼此关联。当然，由于这本书的论题所涉及的范围广，因此，对这些论题所做的任何一项独立的研究本身都不可能十分完整的，而本书只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一步。迄今为止，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其中一种类型的研究具有经济主义的倾向（单方面强调物质因素以至于达到忽视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程度，尽管政治义务与文化价值可能隐含在分析之中）。另一种研究类型是以国家为中心，这种研究方法在大量跨国研究中也有明显表现，它假定公共政策是全球化的驱动力。此外，还有一些锲而不舍的区域研究形式，它们坚持强调某一特定地方的特性和有关它的各种变迁的详细描述，而没有把握这个地方的变化与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之间的联系。纵然这三种类型不能覆盖关于全球化的所有问题，但是，它们当然

在其中还是占据很大比重。

由于大多数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文献是基于西方的经验，我的研究成果则主要来自于非西方世界。与其他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著作不同，这本书以绝非理想化的手法研究全球化主体的心声，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抗击全球化潮流的人的心声。我并不是假定自己代表他们发言，那样做未免是一个未经许可而妄自尊大的借口，我是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害者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化的进程，这些受害者包括：工会运动、处于社会边缘（在某些情况下，这里是民粹主义政客的温床）的人们、世界各地的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边缘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这些群体直接或者更经常是间接地遭遇着这些全球化的推动者：国际流动资本及其在国内的支持者、在限制性贸易惯例面前畏缩不前的出口商、地方的实业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能力与国外的企业竞争）和那些为了从自由化和增加的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中受益而设立的国内金融机构。这些群体反过来与民族主义政客、内向的官员及其他引人注目的保护主义者抗争，后者中的一些人鼓吹跨国流动对国内商业具有不利影响。在这场竞争中，不存在恶徒或者英雄，他们只是怀着具体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的群体行动者，置身于现行的全球性变迁的侵袭之中，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变迁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尽管这些抗拒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孤立、统一的现象，相反，它是各种过程与活动的综合征。在此使用“综合征”一词意在表明在人类生存条件中，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全球政治经济内部相关特征的一种模式。尽管左、右两派批评家中都有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病症，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中，“综合征”一词并不表达医学意义上的一种疾病的症状，因为全球化绝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恰恰相反，全球化作为一系列占优势地位的观念和政策框架已经变得很正常了，同时正如我将表明的那样，全球化

作为一种错误的普世主义而正在受到质疑。“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新区域主义和抗拒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全球化综合征所不可缺少的。尽管这些并不是仅有的要素，但它们作为世界秩序中各种变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引人注目。

“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剖析。它包括世界各区域之间生产的空间重组、各区域之间及其内部大规模的移民潮、将生产过程及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的复杂网络以及在各个过程之间起协调作用的跨国文化结构的出现。而且，全球化通过各国和各种经济力量为寻求打开更大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大的竞争力而倡导的宏观区域主义、包括亚洲的“增长三角”（该词 1989 年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明）和“增长多角”在内的次区域跨边界安排和诸如各种出口加工区等微观区域计划向前推进。“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和在新区域主义中的权力部分有一个对应物，因为它引发了抗拒政治。更具体地说，必将受到限制的权力的某种具体配置引起了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的抗拒运动，尽管这些抗拒运动是以不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权力的配置也会促使加快寻求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可能使全球化的生产性潜能服务于公平的目标而不是使社会隶属于超级竞争的需要，这种超级竞争是由（加强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它体现为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共社会政策退化。

因此，全球化具有矛盾的性质：它带来各种主要的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较高的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的扩大、以更低的价格享用更多的消费品、信息与知识的广泛传播、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减少贫困，以及使许多国家人民从长期的社会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然而，融入全球化所建构的这一全球框架并采纳它的做法就需要付出代价。明确地或者默许地接受被包围在全球化之中的事实都将导致被包围的一方所实施的政治控制受

到削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控制被根本取消，这种情况在全球政治经济最脆弱、最贫穷的地区尤其容易发生。此外，世界市场的渗透和全世界分化的加剧还侵蚀了文化传统，导致新的混合文化形式。

全球化的概念

在大致介绍了这本书的主题之后，我想谈谈全球化的概念，至少将它初步地提出来，以便使其在随后的各章中得到发展。尽管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但它们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① 其中的一类定义表明相互联系或者说相互依存的增加、跨国流动势头的上升以及诸如从某些方面来说，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的加剧。这类定义的典型表述如下：“全球化是指减少国家间的壁垒和鼓励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影响”（Tabb 1999, 1）。福特基金会总裁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而基本上与此类似的定义：

这个术语〔全球化〕反映了一个比以往发生的更全面的相互作用，这表明了“全球化”有别于“国际”一词。它暗示了国家边界重要性的缩小和超越那些植根于某一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各种特性的加强。（Berresford 1997, 1）

^① 关于“全球化”的一些定义，参见 Scholte（1997, 15）。其他有用的资料见 Albrow（1996）；Guillen（即将出版）；Held（1995）；Held, McGrew, Goldblatt 和 Perraton（1999）；Kofman 和 Youngs（1996）；McGrew（1992）；McMicheal（1996b）；Rosenau（1997, 78-98）及 Waters（1995）。

就这个定义抓住了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跨边界流动、特性和社会关系而言，它是特别有用的，但是它没有明确社会关系的本质，也未谈及权力的等级体系问题。

第二类定义的理论性更强，它强调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关于这类定义，尽管也应该提到其他人的作用，但无疑在这方面作出特别重要贡献的有三个人。其中，安东尼·吉登斯对地方与空间做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一个场所的概念，或者说是社会活动进行的一个地理（从有形的意义上理解的）背景，但就全球化而言，后者则是由不在现场的社会影响构成的。空间日益与地方分离，而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同时，古老的时间形式（比如，季节或者农业社会的日升和日落）也开始与空间分离，它本身正在进行各种可能性的重新组合（Giddens 1990, 18-19）。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由此可以被定义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本地所发生的事情受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Giddens 1990, 64）。

戴维·哈维沿着相似的思路，他还注意到时间缩短了，而且当涉及确定原因和结果的时候很难说出所处的是什么空间，由此，他假定“穿越时间的隧道空间湮没了”（Harvey 1990, 299）。由迄今为止最遥远天际支撑的空间形成了一所大学，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各种文化表象，就如艺术展览反映出的那样，而且它还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品构成。例如，食品市场就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随着本地的产品被全国性的、继之全球性的食品所取代，消费模式和价格结构也发生了改变，逐渐与国际贸易融为一体。罗兰·罗伯逊依照同样宽泛的探究途径，他强调在将各种文化实践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情况下，它们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在他看来，全球化的各种文化进程是由全球意识推动的，但他不如吉登斯的学说体系那么强调技术的作用（Robertson 1992, 142 -

45, 183; Albrow 1996, 98)。上述这三种解释都以时空关系概念为轴心，并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对于吉登斯来说，全球化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吉登斯对时空压缩的分析基本与社会技术相联系；哈维与罗伯逊则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分别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变化和文化领域相联系。

在不完全抛弃这种做法而尝试使其进一步深化的同时，我提出了一个有所不同的概念。就如从以下的论述中所体验到的那样，全球化的占优势的形式意指一种历史变迁：在经济领域中体现为谋生和生存方式的变化；在政治领域，地方所实施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不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最初表现得多么微不足道，都将逐渐导致权力中心在领土国家的上、下两个层面上不同程度地发生转移；在文化领域，贬低一种集体的成就或者对这些成就的认识。反过来，这种结构可能导致和解或者抗拒。大多数代理人表示默认，但另一些代理人则尝试拟订一个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各种宏观经济增长过程和新技术，同时还使它们与社会公平和各种改革计划联系起来。在这个方案中，变迁伴随各种市场力量的运作开始，然而，对这种变迁的各种政治反应是最为重要的。鉴于市场显然将继续充当全球化的发动机，那么，在推动和维持或者削弱这种趋势的相互作用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政治与各种市场关系之间总是紧密关联的，但全球化是作为一种对市场权力扩张的政治反应而出现的，它既作为一种支配的形式，也作为一种解放的可能性。

此外，全球化是一个知识领域，尽管它不是一种成熟的范式，但是，它是一种有助于解释世界构成方式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的批判方法，进一步地说，它还有助于灵活地估价社会学家在研究一体化和解体化过程两者之间特殊的相互关系时所运用的范畴。一个标题下面包含大量的现象，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使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层面的分析相互联系。因此，这种框架阐

明了一个由各种不同的跨国的和国内的结构而形成的统一体，它允许一个场所的经济、政体、社团和文化向另一个场所渗透。

与此相关，有必要强调的是某些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它的一些贬抑者同样都热衷于经济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结构已经重现了，而这一次它是由那些不加批评地称赞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全球化的传播者提出的。那些全球趋势观念的普及者（例如，Ohmae 1990；Naisbitt 1996）倾向于假定单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受技术进步推动，市场化本身正在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我认为，不要通过一种经济主义的分析或者政治决定论（像那些认为是国家而不是市场在推动全球化的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而过度地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和模糊这些联系，人们必须识别出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之间的具体相互作用。实际上，全球化是一系列多层面的过程，它具有内在的对自身能力和潜能的限制，因为它产生了对自我的抗拒。换言之，全球化造成的种种不满不仅仅体现为潜在的和公开的抗拒，而有时这些不满已具体化为公开的反抗。^①

方 法

从理论上来说，卡尔·波拉尼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就是，为探讨全球化的基础并将各种从实际经验得来的数据结合起来以免一系列复杂的资料失控而寻找一个有用的切入点。人们不必怀着一种赞许的心态去阅读他的著作也会发现，不仅他提出的关于全球重构的方法独到，而且他所提出的关于概念重构的基础都具

^① 我在就全球化的“不满意形式”作讲演和写作的时候 当时我不知道有两本书也注意到了这个主题，尽管它们研究的方式与这里所作的尝试完全不同。参见 Burbach, Nunez 及 Kagarlitsky (1997) 和 Sassen (1998)。

有启发性。尽管我得转到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家，诸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安东尼奥·葛兰西，而不能单独地或主要地集中于波拉尼的框架，但是，这一框架是我所进行的各种探讨的轴心的统帅，我在几种情况下反复提到、批判和试图扩展的各种概念的试金石。

在《大变迁》（1957，1994年第一版）一书中，波拉尼探讨了在世界经济中由他称之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推动的社会分裂和分化倾向，一个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乌托邦观念所发挥的强制性力量所导致的结果。他描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各种倾向，从中揭示出 30 年代全球政治经济所造成的局面和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崩溃而导致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失业和复活的民族主义等现象，他指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集体否定导致了世界大战。波拉尼的“双重运动”观点包括前所未有的市场扩大导致了极度的社会混乱和强烈的政治反应，后者以社会要求国家抵制市场的有害影响的方式而体现出来。大概与 30 年代的全球经济相似，当代的全球化似乎正接近于一种局面，其中更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将产生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分裂以及对自保产生的持久压力。在下面各章中所分析的各种具体过程是这种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考察这些过程，超越波拉尼 1994 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著作而精选他那些并不太为人所知的著述，从中梳理出市场的扩大与那些同“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新区域主义和各种抗拒政治最相关的具体问题之间结合的含义是有助益的。

为了集中于这种分析，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必须限定全球化的本体论。如果不首先表明构成现行秩序的基本单位就很难由此继续探讨。在实际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是迅速变化的，因此，揭示出不同环境中各种变化的潜在动原十分重要。尽管“本体论”这个术语来自于哲学，是指研究存在或生存

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分支，但是它已经被用来意指探讨的具体对象。这些是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部分世界秩序，这种相互作用将在第一章关于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标题下更充分地论述。就如“不断演变”这个词所表示的，各种具体的研究对象不是一次定型、永远不变的，而是处于历史的运动之中。与此相关，有必要回顾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他认为应该确定出大量的“观察点”用来观察历史。具体地说，布罗代尔假定建立起了与“社会秩序”等级体系、时间和空间相适应的一些轴。他建议沿着这些轴想象诸如分属于不同地区和空间等级体系的那些不同主张（Braudel 1980, 55; Helleiner 1990, 74）。跟随布罗代尔的思路，可以尝试捕捉到即将出现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具体研究对象，而不需以任何方式将它们作为静止的框架而固定起来：

（1）可以用布罗代尔的方式将全球政治经济视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系统。布罗代尔没有将世界经济作为他的分析中惟一占优势的因素，相反，他强调与世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并由此确立全球结构的各种实体。尽管有几种政治和经济实体驱动全球化过程，但塑造全球化过程的跨国公司（TNC）的作用显著增加，原因在于，即使跨国公司本身不是所有者，它也能在几个国家协调生产和控制各种运作（Dicken 1998, 8）。当然，无论如何，大公司绝不是推动全球化的惟一动力。尽管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但是，它们也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代理人，国家的作用尤其通过撤销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框架而得到发挥。

（2）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国家是由虚线边界绘制成的，尽管这些边界部分是可渗透的，但是，国家能够控制各种跨边界流动——一块置于全球经济之上的模板。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更确切地说，国家间体系，绝非像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是流行现象，

因为对于政策而言，例如，那些移民政策，不论实施得多么不完善，它们确实为出入境设置了条件。在跨国流动中生产的组织一部分是在边界之内，而另一部分则是在边界之外。同样，移民运动也是一部分在边界之内，而另一部分是跨边界的。

(3) 各种宏观区域组织，例如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它们不仅在空间上协调资本流动，而且为进入全球化过程提供了通道。宏观区域组织的形成包含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展、现存各种政治单位的重构以及公民资格全部含义的再定位。由于一个人的公民资格与他的工作地点的分离而使植根于一国之内的国籍不那么有意义了。居住在自己的祖国而工作在另一个国家的劳工包括那些跨边界工作的人（例如，法国的居民在瑞士工作）和那些通过电子方法与各种跨国生产保持联系的家庭电脑工人。各种宏观区域组织可能因此而被视为比具有某些政治文化联系的国家规模更大的松散的地理单位，无论它们之间多么不同、相互差别多么细微以及有时多么容易引起争议。尽管生产的全球化是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但本土文化仍然提供归依的中心，同时也为装配线上的生产提供灵感和创造性的来源（例如，在服装的式样、食品和玩具等方面）。文化界限也强化了各种政治经济群体的特殊性。

(4) 次区域模式将各种交点汇集起来，贯穿各个国家，还把临近的概念扩大至包括除地理意义上的距离以外的各种因素。确实，历史遗产和经济力量能够为产业、就业机会和过剩人口转移到其他地区提供推动力和起到示范作用。将许多次区域实体联合成为一个较紧密的全球化网络的典型例子是处在跨国三角区的正在建设中的著名的阿尔卑斯钻石公司，它联合了里昂的纺织和化工工业、日内瓦的金融服务业以及杜林的自动化基地。在形成了电脑联网和商业伙伴关系之后，这些城市正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使它们相互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不足 70 分钟。同斯图加特、巴塞

罗那和米兰一样，里昂也是次区域的繁荣部分，由于它们为欧洲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动力而号称为“四发动机”（Drozdiak 1995）。

（5）在主权国家的疆界之内各种次区域模式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卡塔卢尼亚、伦巴第和魁北克就是在相应各国的政治管辖下享有相对自治权的实体。此外，许多工业区形成了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的内部各种经济和技术力量彼此高度依存，同时，这些力量本身又深深植根于包容更广的交易网络之中。例如，中国国务院决定，微观区域组织（即出口加工区）将作为国家的改革样板，由此使它们担当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取得微观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使经济结构形成“阶梯模式”被认为是必要的。广东省的深圳号称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它是吸引外资并参与“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最大的一个。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内部移民，是深圳扩大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关键的生产要素（Mittelman 1990, 66）。

（6）随着服务部门就业需求的增长，全球领先的城市提供了新的机会，尤其是在“信息业”和低薪岗位，各战略性的全球城市对服务性就业的需求吸引了当地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地区工人的广泛注意。全球性城市完全依靠自己而成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它们直接与全球经济的其他参与者谈判，通常它们所从事的交易都与国家的权威无关。

（7）各种文明社会也正以“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的关键行为主体的面貌出现。有时，它们的活动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得

到体现或者在非政府组织（NGO）^① 中被制度化了，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的表现是不易觉察的和没有正式组织的。文明社会对全球化结构的反应可能出于自地方或全国的层次，这种反应也可能是一种跨国的行动。在不同的条件下，文明社会对全球化的力量作出单独或集体的反应。一个重要的倾向是跨边界网络的增加。因此，一些分析家将网络描绘成一个以互惠和水平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自愿的组织（Keck 和 Sikkink 1998, 8）。在此可以将这些网络理解为：它们不必采取组织的形式，从更根本上说，它们充当各种关系群体，这些关系群体中的成员或组成部分以或紧密或松散的方式相互联系，这一切在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接合点上已经实质上得到了实现。无论文明社会对全球化所作出的各种反应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不外乎是精英，或大众的反应、返祖和分裂，或建设性和有内聚力的反应，这些要素投射出了一种替代秩序的幻景。与全球化协调或者对抗的适当形式和规模以及公开和潜在抗拒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回过头来探讨。

从布罗代尔的同时从许多“观察点”（其中每一个观察点都提供了关于整个图画的不同细微差别）透视的观点出发，可能将全球化这个多层面的过程，或者毋宁说一系列的结构变化，分解成互不相关的联系。这本书的一个限定是“全球化和……”在不忽视社会科学的传统关注点，诸如“社会”（社会学的核心部分）

为了与常规做法保持一致，我使用了“非政府组织”这个术语，但是有保留意见。非政府组织是一个不幸的概念，因为根据定义，它是一个虚无，而它能参照的结构只有国家。事实上，伴随全球化和减少国家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压力，目前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取代了从前由国家所进行的活动。此外，有些非政府组织在财政上得到国家和国家间组织（或者公司）的资助。简言之，全球化模糊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界限。

和“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轴心）等的基础上，本书的注意力转向可能被称为人口层面的全球化：部分是为了避开国家控制的领域和起因于经济和文化（包括某些共同信仰和习俗、移民、汇款、杂居及平行经济）的人口流动。

从经验上来说，重要的是对变化的全球结构作实地研究，原因在于，各地区所经历的全球结构变化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构成某一特定意义时间和空间的许多层面的理解是不可替代的。理论为这种理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途径，而各种结构解释也应有其背景上的限制。

就方法而言，这本书尝试强调当不断全球化的结构与当地的条件接触时所产生的变异。当然，全球化并不是将一切东西都硬塞进同一个模子。我的研究计划是，将各种不断全球化的趋势主要放在两个不同的次区域：东（即东和东南）亚和南部非洲进行研究，前者是全球化的中心，而后者则构成了最边缘化大陆的主要中心点。东亚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快速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直至 1997 年经济危机的开始）连续十年取得超过 8% 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该地区体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活力。这一地区包括日本和中国，它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国，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在 21 世纪初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对比来看，南非 12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1% 的一半多一点，这个数额与芬兰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而这些国家为使自已摆脱这种状况而做出的努力，必将遭遇到不断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的结构上的不利方面（Davies 1996, 26）。

尽管对这两个次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本书是围绕我在 1991、1993、1996、1997 及 1998 年间对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所作的经验探讨而构思的，我对这些国家进行实地研究的时间长短不一，深入程度也不同。我之所

以选择日本和南非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是各自所在次区域的盟主；就被包括在全球化的各种增长过程和权力机制之内或者被排除在它们的外面以及其文明社会的健全程度而言，其他国家则更呈现出了参差不齐的状况。在每一个国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包括持续时间从两个星期到一年不等的多种多样的访问。为了进行这项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我于 80 年代末两次去中国，随后在 90 年代我又到那里收集档案资料，并从事现场研究。我参加过各种抗拒群体举行的许多会议，在许多运动中与他们为伴，这些运动包括去一个有毒的废料倾倒地（Holfontein，南非，1996 年 7 月 20 日），还参观了被作为“祖产”（这个词用于强调土地产权问题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而争论的地方，并且询问过市民协会成员、银行家、商人、官员、部长、议员、高级法官、记者以及当地的学者和学生。

我在上述提到的国家中进行了 100 多次单独的访谈。我强调“单独的”是因为，在一些情况下，令我惊喜的是，一个组织中不只一个成员未曾预料地在单为一个受访人而计划的约会中出现，并参加到已经变成对一个群体的访谈中来。这样，起初有计划的访问随之就变成自由式的论述，一般这种会谈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他们立刻就觉得全球化的框架显得太大，因而难于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但是，如果大家能确定一个更精确的范围、恰当的规模、更有差别的问题，那么，全球化的各种结构就变得清楚可见了。受访者友好地与我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察，在一些情况下我要求他们署名，而另一些情况下则要求匿名。正如在第一章所陈述的（随后在第九章关于重新定义抗拒政治中将展开论述的），这些受访者是根据被视为本书理论核心的几个范畴来选择的。其中，我发现行动主义分子们直接或者间接地挑战各种全球结构，特别是，但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在下面的分析中将详尽阐述的理由而）追求环保目标的那些

人，尽管他们也围绕有关社会公正的其他理由进行动员。当然，我在一种情况下向受访者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与另一种情况下的不同，但在所有的场合都涉及跨边界问题。

除了进行正式的访谈之外，我还与国际的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进行了大量非正式会谈，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菲律宾的“人民组织”和南非的“社区组织”及商界、政府、国际组织、媒体和大学。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纽约和华盛顿度过的，因此，我寻求利用这种机会对全球化的核心增长机制、重要的国际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实地探讨。

这里所采纳的方法不一定导致一种系统的次区域比较研究或者一种排他性的解释——那是对许多国家的经历的令人费解的描述。这些不是本书的目的。相反，实地采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证明或修改我的论点提供论据，而且也是为了提出关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其结果可能如何这些基本问题。最后，一些章节当然比另一些更具有理论性，而有些章节主要是为了观察分析的命题提供说明性的材料。在无法获得数据或者当不可能获得系统的或可比较的论据时，我尝试避免进行跨区域分析。如果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或者一个来自东亚和南非以外地区的异常例子，我就放弃写作中关于对称的标准而毫不犹豫地将它引入书中。

本书包括一章导论“全球化的动力”和一章结论，结论部分展开了主要的观点和思考了各种替代方案，这些问题分为与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相适应的三个宽泛的范畴。第一部分的四章考察了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与分权：劳动分工理论，继之论述了“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的重要方面，即移民、贫困和性别和以莫桑比克为个案研究了边缘化问题。莫桑比克是一个处于“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底层的国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该国通过遵循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就从中吸取经验而言，莫桑比克的成就值得仔

细观察。第二部分是关于新区域主义，其中各章分别论述区域主义概念的再思考、霸权和区域主义（这种探讨也集中于地缘政治，它是全球化研究中关于地缘经济学问题的补充）以及次区域对全球化的反应。第三部分探讨了对全球化的抗拒问题，其中的各章分别关于抗拒的含义、环境的反作用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它不仅损害了全球化的合法渠道，而且在制定新的规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全球化方案这样一个宽泛的主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问题应该研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例如金融（Mittelman 1996；Mittelman 和 Pasha 1997，尤其在第三章中）和军事战略中的安全方面（Mittelman 1994, 1997a），但是，另外一些主题也值得研究。然而，我很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发现那些浮现于头脑中的问题或者超出我的专长所及，或者超出本研究项目承担的范围之外。

简言之，以下各章试图解释全球化与当代主要问题的关系。这本书强调各种不断全球化的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结构贯穿于对极度不同（如果说不是最不同）的世界各地的不同层面的分析之中，这里所说的各地之间的差异是根据持续的经济发展和边缘化作出的评估。与全球政治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的幅度相吻合的图案呈“之”字形（像 90 年代后期亚洲经济危机表现出的那样）和反“之”字形。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全球化的系统动力、它所带来的无数后果和引起的各种各样反应。

第一部分

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